

最新一期半月谈杂志透视基层官场应酬风,披露西部某县的“吃喝事”: 接待办主任一晚赶8个饭局

半月谈编者按: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开会议,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,强调要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,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。规定明确提出,“要轻车简从、减少陪同、简化接待,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,不安排群众迎送,不铺设迎宾地毯,不摆放花草,不安排宴请”。这些要求可谓切中时弊,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了解到,官场接待应酬之风不仅影响了工作,不少官员也深以为苦。看来,狠刹此风正当时!

“一晚赶8个饭局”

尽管中央三令五申,但一些地方“嘴上腐败”“接待浪费”依然严重,接待应酬频繁,“三公消费”泛滥。其实,繁重的接待应酬也给基层干部带来沉重的身心压力,他们身在其中却又无可奈何。“我们是个临海县,每次接待都要安排去海边观光、吃饭,有时候我是刚刚送走这一拨,脚还没有挪地方,下一拨又来了,一天去海滩四五次是正常不过的事情。”一位负责接待的基层干部老覃说。

县委书记是权力较大的一个群体,也是应酬繁多的一个群体,晚饭赶场子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奇怪。一位县委书记向记者抱怨: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。不论哪路神仙来,我这县委书记只要在家都得接待,一晚上吃四五顿饭是常有的事情,即使这样,深夜回到家里还要再啃馒头,因为每到一场都要敬酒,哪有时间吃饭!”西部某县的接待办主任也说:“我有一天晚上赶了8个饭局,回到家里还得煮面条。太累人了,有时候我们接待办的工作人员轮番上阵都吃不消。”某边境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,每年接待费却高达近千万元。县领导说,

“一次,一些人到县里捐物资扶贫,但是来了20多人,还要去景点玩。捐的物品不值多少钱,县里的接待费却花掉了好几万。”

基层接待主要有三大类型

记者采访发现,基层接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:

一是调研考察型。“上级领导到基层调研考察往往遇到层层加码的问题,比如一个市级领导到一个乡镇考察,县、乡镇的主要领导都会陪同,加上县、乡相关工作人员,动辄二三十个人,有时候加司机就能围上一桌子。”曾经做过领导秘书的小罗说。

二是检查督办型。记者调查发现,到年底时,林林总总的巡视组、检查组、督导组轮番上阵,让基层不堪重负。一些工作是“上面来人装模作样走过场,下面接待认认真真搞形式”。“这类的接待最让人头疼!”中部某县的韦姓副县长向记者诉苦,现在考核很多,每到年底,各种名目的“考核验收团”就会到县里“潇洒走一回”,但有些考察基本是走过场。“每个副县长都分管一摊工作,如果检查没有通过,县长就可能被约谈,我

们做副县长的压力就大了,所以在接待时哪敢马虎,喝过酒,有的还要唱歌。不过只要接待得好,一些考察就会顺利通过。”这名副县长说。

三是业务交流型。各地之间,有些所谓的考察、交流其实就是个幌子,游玩才是目的,地方政府虽然明白,但是也无奈。

过于频繁、破费的接待当休

繁多的接待应酬,身体吃不消,不少干部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,血脂高、血糖高、血压高等所谓的“三高”成为官场常见病。

西部某地级市曾发生一起突发事件,市委书记连夜驱车两个小时赶到现场,开完协调会已经是凌晨了。这位市委书记对记者说,赶来现场之前,他还在医院输液,在市里面当领导不仅工作压力大,频繁地接待,特别是过量饮酒,也让身体吃不消。

“所有来检查的上级部门都希望县里主要领导陪同接待,问题是上面部门密密麻麻,县里的主要领导就是那几个人,应酬起来捉襟见肘,赶场子的现象自然难免。”一位县长说。

过于频繁、过于破费的接待应酬,则不仅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,还造成了巨大浪费,给部分地方的财政造成很大压力。一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,他们县年财政收入1亿多元,光接待就要花去300多万元。“这还只是县委、县政府层面的接待费用,没有包括20多个局和乡镇的接待费用,你想想,一年要浪费多少钱。”他说。

观点

刘青:吸取“四菜一汤”的教训

昨晚,就相关话题,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江苏省委党校校政政部副教授刘青。

1 搭便车推动“嘴上腐败”

“嘴上腐败”由来已久。在当初一些地方以GDP发展为最高目的,以招商引资为工作重心的条件下,官场接待应酬可能是“合理”的,饭局也会特别多。然而,抛开这一因素,有的干部在其中利用各种机会搭便车,推动“嘴上腐败”。

就官场应酬而言,既有公共利益,也有个人利益,还有体制上的因素,混杂在一起,造成一种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。每年民众都非常关注三公消费问题,而吃喝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“枝节”。用公款来满足个人的私欲,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。

2 吸取“四菜一汤”的教训

艰苦朴素的作风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和落实。我们也有很多控制“嘴上腐败”的制度,但收效不显。在实践中渐渐走形甚至已经快被人遗忘

的“四菜一汤”制度就是一个例子,最后,出现了利用“四菜一汤”的形式浪费公款的情形。关键在于好的制度没有得到好的贯彻执行。

3 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

“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”,加强监督是一个重要内容,如通过微博来监督。当然,一些监督手段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,原因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够。不少一把手也表示不想参加官场应酬却身不由己,但是在一些官场恶习中,他们也是参与其中的一分子。而说到民主,预算民主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,预算

不科学、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存在,小金库问题仍然存在,也正因此,官员也就有了大吃大喝的钱。

“接待无止境”,让人瞠目结舌,问题还是对预算方面控制不力。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源,而又不受“限制”地支出,问题就出来了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刘方志

新华时评

城市要“面子”但更要“里子”

近年来,各地竞相上马形象工程,先有苏州的“秋裤楼”,再到抚顺的“生命之环”,而在武汉等城市,豪华公厕也成为城市的“面子”。与此同时,有城市围住绿化带“石凳”不让旅客休息,有城市曝出流浪人员冻病而死在桥下。我们不禁要问,城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“面子”?

无须讳言,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,城市形象很重要,外可提升美誉度,内能加强认同度。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,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注意并重视城市形象,轻则花重金打造城市宣传片,重则大力推出各种“地标”,

将城市的“面子”打造得光鲜漂亮。武汉豪华公厕大抵也是出于这种心理。

然而,当我们的城市在繁华程度上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国际大都市时,城市内核的“里子”却相形见绌。无论是暴雨之下呈现的“海景”尴尬,还是上下班高峰交通拥堵的烦恼,抑或是农民工孩子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,都大大抵消了重金打造的“面子”。

城市应该有真正的“面子”:干净整洁的街道、井然有序的秩序、文明向上的市民、舒适安全的服务设施,都是城市最好的名片。当一座城市只有“地标”而无

“地气”,有喧嚣的热度而无关怀的温度时,城市的主人难以产生归属感,城市的“面子”更无从谈起。

城市的“面子”需要特色更应务实。诚然,公厕确实是城市的名片,但是人们更在意的是公厕的数量和服务而非豪华程度。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远未达到富足的地步。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,“面子”工程花钱多了,教育、医疗等“里子”项目的资金必然减少。当还有许多群众为上学看病而发愁的时候,豪华公厕就显得尤为不合时宜了。诸多景观建筑之所以饱受争议,原

因就在于违反了务实原则,忽视了民意诉求。

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:要多谋民生之利,多解民生之忧,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,在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,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。

与其把心思放在努力打造各种“地标”甚至建造“遮羞墙”上,远不如沉下心来做好“里子”工程。人民的生活越幸福,城市就越有面子,这也是“实干兴邦”的应有之义吧。

新华社记者 白靖利

公民发言

40亿的办公楼是怎么盖起来的?

又一座豪华办公楼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。济南政府大楼建筑面积37万平米,造价40亿,里面走廊周长为1公里,有40多部电梯,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单体建筑,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,现为济南市委市政府驻地。

(12月11日人民网)

确实是大手笔。这个40亿是怎样的一个概念?去年济南市的财政收入为325.42亿元,也就是说,这个造价达40亿的大家伙,花去了济南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还不止。花这么多的钱,即使在政府搬入之前是作为全运会指挥中心,其预算和支出的合情合法性,仍然要打个问号。

对于豪华办公楼,公众对此甚至已经接近于审美疲劳。去年两会期间,新华网曾刊出了《国内豪华办公楼大曝光》一文,图文并茂,并由此掀起了一场网友积极参与的政府豪华办公楼随手拍活动。在公众舆论如此关注、“风声”日紧的境况之下,各地依然逆风而上,各种豪华的楼堂馆不断粉墨登场,这其中的奥妙,确实值得玩味。

对比有人分析说,这是权力美学在作怪,这当然没错,但归根结底,如果没有花钱的自由,美学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。花了这么多钱,40亿,是需要公共财政预算的。从理论上讲,公共预算理而且必须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,如果公众对这40亿之巨的花费能参与制定预算并随时监督的话,这座豪华办公楼恐怕不会这么轻易拔地而起。

因此,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豪华办公楼的层出不穷,尚需建立一个更严密更透明的公共预算体制,让政府无论是花一分的小钱,还是花40亿元的巨款,都能看得见、摸得着,都能让老百姓有话语权、否决权。

(石敬涛)

热点纵论

“拆迁先进”们究竟有哪些事迹?

山西吕梁市临县的一份表彰决定近日被贴到政府官网上,表彰“征地、拆迁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工作者”。获奖者达72人,多为临县下辖的乡镇、支村两委领导,包括镇委书记、镇长、村支书和村主任等,总额为72.5万元。记者前日采访到的获奖者证实,他们已经拿到了奖金,因为补偿款低,当地的拆迁工作不好开展,但最后问题都解决了。

(12月1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 奖励“先进”很正常,不算什么新闻,但是,奖励“拆迁先进”却成了新闻,而且是焦点新闻,这是何原因?原因在于,“拆迁”一词比较敏感,当“拆迁”与“先

进”、“奖励”等词同时出现在新闻中,更容易引人关注。很多网民对此的评论是该不该奖励,而我更关心,这些“先进”究竟是采用了什么手段,能让棘手的拆迁问题顺利得到解决?

众所周知,在我国走向城市化、工业化的今天,拆迁问题已成为当前一个重大社会矛盾,轻则,被拆迁人的利益在拆迁中受损,获得极少的补偿,而地方政府倒手之后,立即赚走数倍利润,造成社会公众对拆迁普遍不满。重则,拆迁引发流血事件甚至生命损失,不仅影响恶劣而且违法。因此,公众很想知道,临县这些拆迁“先进”的光荣“事迹”。

比如说,这些解决问题的“高手”,在拆迁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强制拆迁,有没有采取欺骗或者威胁的手段解决棘手问题?公众很想通过阅读他们的“事迹”知道答案。如果说,这些拆迁“高手”有成功的秘诀,如果他们的拆迁手段是完全合法的、公平的,我认为,不妨把成功经验介绍出来,然后进行全国推广。如果不公开他们的“事迹”就进行奖励,难免让人产生怀疑。

一般来说,某些地方政府达到拆迁目的不外乎两个法则,一个是强制拆迁,或者威逼利诱;一个是合法拆迁、合理补偿。然而,从报道中看不到这些拆迁

“先进”究竟运用了哪种法则。在当地“补偿款低”这一点来看,合理补偿恐怕谈不上。如果不能合理补偿,那么,某些官员拆迁所使用的手段就让人怀疑,是不是采用了不为外人道的某些阴暗手段?

在我看来,如果这些拆迁“先进”真的是合法拆迁,对他们进行重奖,公众完全可以接受,公众最为担心的是,某些官员采用了违法或者暴力的手段实施拆迁,不仅没有得到惩罚,反而还获得奖励,这就等于是变相“鼓励”地方官员使用违法手段搞拆迁。

(张海英)